



# 爱莲守拙 正道直行

## 汝城濂溪书院

□ 姚选民

### 汝城与濂溪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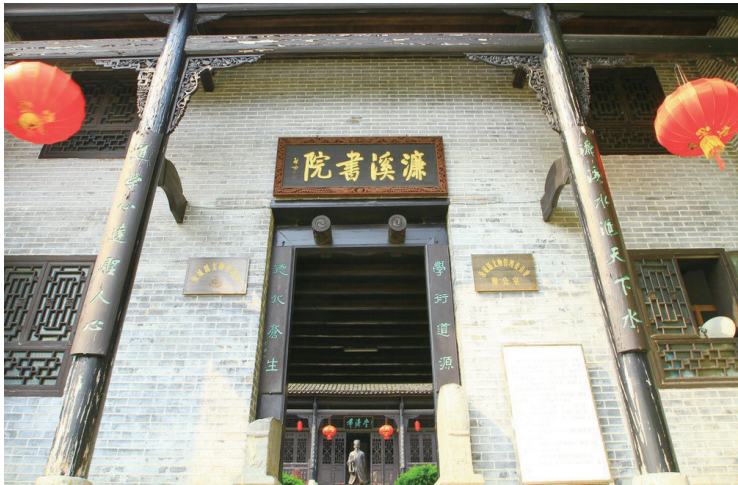
熙宁六年（1073年），濂溪先生魂归道山。为表感念之情，汝城人民在县城西郊桂枝岭麓修建了濂溪书院。该书院始建于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从当时县令周思诚建濂溪祠起，几经盗火，九异其址，但薪火相传。周敦颐创建理学后，汝城虽地处僻壤，但文运昌盛，可谓人文蔚起。一方面，濂溪理学精神代代传承。仅汝城一县，古祠堂竟有700多座。许多古祠堂的大门两侧或大堂之上，有“忠孝廉节”四个醒目的大字，无不把理学思想的精神教化作为根本。在祠堂命名上亦充分彰显了理学精义，如“五礼堂”“五经世第”“敦本堂”等名称。另一方面，培育出了许多经世人才。自宋代至清代，汝城人才辈出，历史上有宋代状元朱经贵、左中大夫朱谔，明代两广总督朱英、监察御史范格、工部尚书曾鉴，清代翰林何庆元等人物。受理学思想之润物细无声式浸润，汝城“御史世家”不绝如缕，如宋代的邵晔与朱谔，明代的朱海与朱守恕父子等。可以说，濂溪理学思想涵育了宋以来汝城人一种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之“爱莲守拙，正道直行”人格。

### 濂溪书院与红色文化

濂溪书院春风化育着古今汝城人的人格秉性。开国上将朱良才将军和李涛将军就曾在“濂溪书院”求学立志。光绪末年，知县董桢祥将濂溪书院改为濂溪高小，后改为濂溪学校。朱良才将军（1900—1989年），出生于该县，成长过程中受过濂溪书院熏陶，长大后投身革命，参加了湘南起义、黄洋界保卫战、长征等战役战斗。他写下的《朱德的扁担》后登上了小学课本，毛泽东夸赞他没有私心，是所有干部的楷模、“军之良才”。李涛将军（1905—1970年）是该县延寿瑶族乡新村村人，曾在濂溪高小就读，投身革命后参加了秋收起义、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长征、东征等战斗战役。李涛将军一生为官清廉，对自己和亲人都很“抠门”，没有官架也不搞特权。两位将军不平凡一生的“平实”言行直观地反映出了濂溪理学“爱莲守拙，正道直行”思想精义在他们身上的文化烙印。

### 周敦颐与汝城

自皇祐二年（1050年）调任桂阳（今汝城）令始，到至和元年（1054年）改知洪州南昌县止，周敦颐任汝城县令四年。主政汝城期间，是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孕育、形成和成熟的重要时期。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太极图说》《拙赋》等千古名篇，奠定了他在中华儒学史上的理学鼻祖地位。无怪乎，清代学者王闼运说道：“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一儒学史上的历史名对，不仅道出了濂溪理学对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影响，更是间接指出了“汝城时刻”在濂溪先生“陋于希世”之人生中的特殊重要性。周敦颐于汝城县令任上，“移郴之桂阳令，治绩尤著”。一者，在四年不长的时间里，他兴教育，创县学，传理



## 古代书院蕴含的德育关切

□ 刘晓川



书院产生于唐代，源出于私人治学的书斋与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经过唐末五代的发展，宋朝初期书院逐步发展成型，并在明清时期发展成为一种教学、研究相互促进的教育组织形式。中国古代书院在载道问学的同时，尤为注重德性，蕴含了明伦修德的德育关切。

### 建构重“蕴德”

作为教书化人之地，中国古代书院对自身建筑构造的要求是很高的，从选址、内部构造，到建筑装饰、景观布置，都蕴含了丰富的德育内涵。

书院的选址十分讲究，除了注重自然的山水特征外，还特别强调历史文化古迹、名士遗踪等人文环境，以便“远尘俗之囂，聆清幽之胜，踵名贤之迹，兴尚友之思”。文人的琅琅读书声、优美琴声与大自然的风声、雨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有声有色、动人心弦的美好图景。这其中所蕴含的是开展学术研究所必需的独特精神和超越情怀。

通常来说，中国古代书院建设在体现装修质朴内涵的同时，既避免了世俗之气，也规避奢华之风。每一组院落、每一间房舍、每一方石碑，甚至每一片砖瓦，往往都蕴含着隽永的德育内涵。正所谓“道德以为之地，忠信以为之基，仁以为宅，义以为路，礼以为门，廉耻以为垣墙，《六经》以为户牖，《四子》以为阶梯。”书院中最常见的“崇德堂”“义路”等

称谓，就是一种最直观的表达。

中国古代书院在设计建设过程中，偏爱用梅兰竹菊、松柏莲荷等富有寓意的植物点缀庭院，这些植物是君子气节的代表，能够感染教化生徒的思想认识，发挥德育功能。

### 课业重“修德”

书院学习的内容除“四书”“五经”之外，大多有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朱熹的《朱子语录》、王阳明的《传习录》等书。以儒家典籍作为书院主要教材，是对生徒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因为，儒家学说特别注重人的素质和道德修养。“四书”“五经”中蕴含着丰富的诚信修养思想。例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以儒家典籍作为书院的主要教材，使生徒在熟读儒家著作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诚信教育，进而养成诚实守信的君子人格。

中国古代书院的“自修学程”尤其鲜明地体现了对道德修养的重视。如清初名儒李颢在陕西关中书院讲学时，就提出了这样的自修要求：首先是黎明即起，肃然端坐一会儿，以平定夜晚时的心气。摒除杂念，反观内心，让身心处于一片静谧清朗之中，在意念未萌动之时修养身心。其次是中午，饭后读《大学衍义补》，仔细研读琢磨，弄明白其中的道理，进而培养道德。最后是晚上，静静地坐着，默默反思今天思想上端正和歪斜的地方，反思今天在言谈举止上的得失。

### 严规重“树德”

书院的院规各有侧重，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成人”，培养生徒在人格、德性、操守、修养上，处处表现出卓越性，

即寻求人的内在素质的提高。朱熹所著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于此最具代表性，并因此成为后来很多书院院规的母本。朱熹在院规中写到，要广博地学习、详细地请教、勤勉地思考、明确地辨别、忠实地行事。朱子所拟定的“揭示”，通篇关心的都是伦理的建设和德性的培养，是寄意于学院的学者以尽伦完德为根本追求。

宋代名儒吕祖谦在为丽泽书院制定的院规中规定：那些对父母不孝顺、对兄弟不友好、对宗族不和睦、对朋友不真诚、言行不一致的人，都不得进书院。

姚勉游学于西涧书院，在其所订立的院规中，则尤重“六德”。他在院规中写到，周代所举荐使用的贤能之士，必定是有高尚品德、高洁言行的人。所谓的德，是指六德，就是有智慧、有仁爱之心、人格超拔、讲信义、遵守中庸之道、与人和洽；有了这六种德行，就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睦爱族人，联姻于亲戚，被朋友所信任。

### 以身作则重“显德”

书院特别注重发挥教师的道德表率作用。书院在选聘教师时，把品德高尚作为首要的标准，其目的就是为生徒良好思想品德的形成提供榜样。因此，古代书院教师对生徒的道德表率作用体现在注重修身、敬业爱生等各个方面。

教师的以身作则，即意味着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注重自身的德性培育。例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时给弟子们的印象就是非常讲究威仪容止，举凡衣食住行都是行止有度；走路稳健，坐姿端而直。闲暇时，天还没亮他就起来了，穿好礼服，然后祭拜祖先和先圣先贤，礼毕就端坐于书房。宋代儒杨简，其言行举止也深得弟子

称道：没有一点瑕疵，虽在偏僻无人之处，也如同面对广大宾客一样，虽然已经耄耋之年，做事仍然谦虚敬谨，从不懈怠。

书院的大师们不但德行学问堪称表率，而且特别关心学生的进德修业。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在龙门书院主讲期间，常与诸生讲习，终日不倦。他每隔五天就要询问每位生徒的读书情况，询问他们做了什么事，并帮助他们答疑解惑。

对于书院生徒来说，与自己朝夕相处的教师是道德伦理的真实实践者，在心理上容易信服并且模仿，进而达到学生尊师重道的德育效果。据记载，钱大昕在金陵钟山书院、太仓娄东书院等都曾任教，门生有2000多人，其中功名成就者不可胜数，他们对钱大昕都钦其学行，并且都以师道尊重他。

### 礼祀先贤重“敬德”

对于中国传统书院而言，礼祀是与藏书、教学并列的三大功能之一。书院礼祀的首要功能是礼敬先贤和崇德报功。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就将历代名人的书帖以及包拯的诗文，加上按语刻于院内，以供学生观摩学习。岳麓书院则画有十哲及72贤之像。虽然各地书院所祭先贤各有不同、形式各异，但书院这种做法，既突出了尊德尚道，又体现出了对人格典范的重视。

除此之外，书院礼祀不仅是朔望参拜，其本身也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包含着尊师、重道、崇贤、敬学、尚诚等丰富的教化内涵。

中国古代书院运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书院学子，其在教学理念和学术思想等方面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让中国声音洪亮而悦耳

□ 骆光宗 李 雯

朝，各国纷纷派出遣唐使，来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技术，这就是文化感召力。

文化感召力与国家实力相关，更与文化形态、传播方式相关。文化要有感召力，首先得有特色，有特色的文化才有吸引力、生命力。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特色鲜明，文化推广潜力巨大。文化需要如何走出去？需要更多的策划，这也许是一部电影，也许是一个故事。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我们去挖掘这些文化中的时尚要素、流行元素，提升其国际魅力。

文化要有感召力，还要让人信服，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增进国与国之间的了解、建立信任、增强认同，着力打造国家名片。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情义相融，才能让我们广交朋友，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朋友圈”。

以中国故事提升形象亲和力。亲和力是一种让人愿意去亲近和接触的力量。会讲故事的人总是让人亲近的，“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我们讲好中国故事，重点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自信的、开放的、发展的中国，塑造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好的故事在于真实，在于真挚的情感和真诚的态度。比如李子柒的视频，虽然没有一字英文，却让数百万海外粉丝“一边看不懂一边看，一边求翻译一边看”，这是人们对爱、对向往的生活产生了共情。我们的故事有很多，可以是历史、是文化，是尊重、是奋斗，是追求真理、是追求梦

想，总之，是能引起世界共识、共鸣的点点滴滴。

好的故事内容为王，设计至上。作为文化的载体，如何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进行精准传播，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创新传播方式，主动制造话题，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构建起国际社会乐于接受、易于理解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展现故事背后的思想和精神力量，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应有之义。

以改革成就提升中国话语说服力。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事实是最好的证明。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出“中国速度”和“中国奇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发生在中国大地之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是最有力的说服。

我们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摆脱了绝对贫困，这不仅为世界贫困治理丰富了理论，形成了中国经验，更为世界消除贫困、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此同时，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了沿线国家经济发展，让国际减贫合作成果惠及到更多的国家和人民。成就彰显优势，成就坚定自信，我们要用中国理论去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去升华中国理论，让中国话语在世界上更加掷地有声。

以守正创新提升国际舆论引导

力。引导力体现在有的放矢、取得实效上。回顾历史，我们党从延安时期就注重讲好自己的故事，为了争取舆论的支持，我们邀请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北，这是党对外宣传工作一次成功的尝试，我们向世界宣扬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传播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的真实形象。《红星照耀中国》一经出版，便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感召和鼓舞了如白求恩、阳早、寒春等一大批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陕北这片热土，投身红色革命。

近年来，为适应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我们党也在舆论引导力的发挥上进行持续探索创新，比如建立中共中央新闻发布制度等。通过主动开放、交流与合作，回应国际社会关切，有针对性地引导国际舆论更好地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

党。提升国际舆论引导力的目的是让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得到世界更多的认同与支持，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有了这个明确的目标，我们就要坚持正确的方向，以更开放的心胸，更坦诚的态度，更创新的方法，聚焦于改革发展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让中国声音在世界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